2023年8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:何玉新 美术编辑:卞锐 TIANJINDAILY | 天津日报

阿来 致敬心中的精神高原

本报记者 何玉新

印 象

行走世界 万物有声

近日,“行走的力量——阿来新书《西高地行记》发布会”在成都阿来书房举行。著名作家阿来与作家卢一萍畅谈“行走的力量”,带读者进入“万物有声”的文学之旅。

《西高地行记》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,收录了阿来自2011年以来创作的九组长篇散文。从四川到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云南、贵州,阿来抬头攀行在雪山之间,俯身凝视花草生灵,在行走中记录下所见所闻和人生感悟。他书写大地、星光、山口、银环蛇、鱼、马、群山和声音,把读者引向更广阔的精神空间。

谈到“西高地”的具体方位,阿来说:“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地理环境,就是青藏高原,但又不包括更宽广的整个青藏高原。我想叫它西高地,整个都是西部的高原地。当我以双脚与内心丈量着故乡大地的时候,在我面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西藏。”

阿来曾和莫言一起旅行,他对植物的了解令莫言惊讶,后来莫言为他写了一首诗,开头便是“欲知草木问阿来”。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也称赞:“阿来是一个博物学家,他对自然充满了热爱和敬佩,有一种凝视和珍惜。”

卢一萍说,阿来的散文常被其小说的光芒遮蔽,其实《西高地行记》等散文集和《尘埃落定》《云中记》等小说一样,都构成了阿来文学世界的一部分。他在对话现场转述了一位评论家的话,“阿来有力地拓展了文学表达的疆域,并以自己的方式为文学建立了一种超越性。因为没有超越性的话,文学仅余下世俗,就会显得琐碎、平庸,由于轻浮和浅薄,就会匍匐在地立不起来。”

从宏大的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,到“故乡春天记”聚焦花草树木,常人忽略的事物,都会引发阿来对大地、对万物,包括对现实和对世界的思考、认识。作家的创作源泉通常来自两个领域,一是他身处的大地,二是他通过书本对世界的认识。与其说阿来在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学空间,不如说在深挖属于他的文学矿藏。他与他所钟爱的藏地高原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一种紧密联系,他更像一位行者,是自然之子、大地上的作家。

阿来在新书《西高地行记》发布会上(图片来源:阿来书房)

人生要想走向开阔 就必须去了解世界

记者:行走对于作家的意义是什么?

阿来:我可能不太喜欢托尔斯泰,因为他不出门;我也不那么喜欢博尔赫斯,因为他也是一直待在图书馆里。另一种作家,他们会很认真地写东西,但他们觉得人生要想走向开阔就必须去了解世界,广泛接触大地上的文化、地理和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体。书斋里的作家可能只有一种体验,就是写作的体验,但我们是行走的体验、认识世界的体验,我们深入这个世界,呈现这个世界,是双重的体验。所以行走确实是非常重要的,这样的写作才可能更精致。

记者:您对藏地的植物非常了解,这种关注是从什么角度进入的,想获得什么?

阿来:我们在大地上行走,首先是地。地上道路的开辟,有一套系统的功能,跟地球、跟地质结合在一起的一套专门的知识,这套知识叫地质学。我们看到一座山,山有山的历史;我们看到一条河,河有河的历史。比如祁连山,它的地理史、文化史是什么?祁连山下独特的河西走廊的气候怎么样?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黑水,它既有地质上的修辞,也有文化上的修辞。山上河流滋养生命,不光是人,也不光是马,我们要认识这些生命,就要进入它。不是我要成为拥有植物学知识比较多的人,而是我要书写这片大地,就必须认识这些生命体,叫出它的名字。孔子说“必也正名乎”,认识世界,首先要给它命名。作为写作者,要给读者提供新的知识,提供掌握新知识的方法,提供一种体认世界的路径,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的态度,提供一种世界观。不是我要炫耀我认识一千种花、两百种树,而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,如果连它的名字都叫不出来,又怎么书写?

记者:亲近自然可以给您带来哪些收获?

阿来:大自然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。我们生而为人,在这个人世间,确实时常会产生窒息感,缺氧了,自然界能给你补充氧气。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人间社会走出去,到自然中去呼吸,感受那种生生不息的美丽。我不是去寻找答案,而是去倾听,去感触,去思考,去证实,在那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。

行走青藏高原 重新认识大地

记者:您的行记蕴含着对世界的思考,这本《西高地行记》也是行走和思考的结晶。它也被称为一本探险之书,探险意味着发现,您在行走的过程中,具体发现了什么?

阿来:到底什么叫做发现?我举一个例子,前几年雅安市纪念大熊猫发现150周年,发现人是法国动物学家阿尔芒·戴维德。那问题来了,凭什么是外国人发现了大熊猫?我们的古籍里也记载过啊,只是它不叫熊猫,叫貔貅。古时候没有保护珍稀动物的概念,唐代宫廷里用熊猫皮做装饰,它的肉也可以吃。后来有人出面说,改一下,戴维德的发现叫“科学发现”。科学可以把世界上的东西分门别类。地质学是把岩石分门别类,不同的性质、不同的矿物含量,这块岩石是十亿年前的,那块岩石是三亿年前,看岩石就能知道这个地方的地质年代。那几天我从山上下来,总能看见一种花儿,一看见这种花儿,我就想起戴维德,在生物界这个花儿是他发现的。他不光发现了熊猫,也发现了好多中国的动植物,科学界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花儿,以此来纪念他。

最早对河西走廊的考察,也是在民国时期,由中国和外国的考古、地质、人文科学家共同组队完成的。后来我们逐渐有了对自己土地的研究。所以重新发现我们的土地,这也是我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。

记者:现在环境、生态都是热门话题,您如何看待这种热度?

阿来:土耳其诺奖作家帕慕克说过一句话,你连身边20种植物都说不出来,你告诉我你是一个环保主义者,我是绝对不相信的,你只是一个口头上的环保主义者。我们既在认识这个世界,同时还要怀疑自己。人的自我怀疑非常重要,它带来了一种自我矫正的可能。

记者:这些年您一直在西部的崇山峻岭间奔走,今年年初已经多次去过三江源了,有哪些体会?未来也会写成书吗?

阿来:我从去年开始定了一个计划,趁着现在身体状况还允许,走一遍三江源。具体位置就是在唐古拉山脉两边、巴颜喀拉山脉两边的黄河、长江、澜沧江源,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。去年我们走了黄河源,长江源走了一半,没有完成。今年6月,我又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继续走,走到格拉丹东雪山,就是今天地理学认为的长江正源的起源处,姜古迪如冰川,海拔5400米。然后我们又走了澜沧江源和怒江源。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的水有一部分是内流河,这些水变成高原上的湖泊以后就不再流出去了,形成了西藏第一大湖泊色林错湖,我们也走到了那里。三江源对于中国非常重要,当下全球变暖,国家、民间都非常关注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,我也想以自己的方式加入进来。

句子不是想出来 而是因为当时我在那

记者:包括很多作家在内,现在都失去了描写风景的能力,您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?

阿来:比如我们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,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,但是一般书写的话,无非是加上一些词汇,美丽的草原、宽阔的草原、碧绿的草原。我没有。我们不是在徒步,也不是坐在那个地方静静地瞭望它,我们在以比较快的速度前进,而且是在车里,不是在马背上,不是坐直升机。我们的视觉里是相同的东西,绵绵不绝,不断从水天云天相接处升起来,远了,近了,一晃而过。那边还有一条天际线,它就像滑落下去一样,所以汇聚、分散、滑落。这时候我们就要分析、体会自己的感受,要去想这种感觉该怎么写,在实际的情景体验当中自然会产生。举例说,我从山下感到身心沉重,到山上深呼吸,内心会有复杂的感觉。句子不是想出来,而是因为当时我在那。有人说老是写不好,写不好其实不是技术问题,而是因为我们为这种写作所储备的知识不够丰富。

记者:您曾担任《科幻世界》杂志总编,对科幻文学非常了解,也曾评价刘慈欣的小说有一种粗粝之美,能否具体从写作方法上解释一下?

阿来:作家要面对书写对象的体积。一瓶水你当然可以细致描写,盖子是什么样,瓶身是什么样,摸上去像什么,看起来像什么,因为它体积小,一两百字就可以把它写透。但如果写一栋房子,一条街道,还是两三百字,还能像写这瓶水这样写吗?刘慈欣就是在处理一个更大的宇宙尺度的问题,你能要求他像写乡村的作家,从村里那口水井、那棵老树写起,先写3000字吗?他的宇航船要起飞,要飞到火星,甚至慢一秒钟就会错过火星,能用这么细致的方式去描写吗?同样尺度、同样口径的物体,着力的笔墨不一样。所以有些粗放是有必要的。再举一个例子,在30年前,我们装修必须石膏吊顶,要给我画出一朵朵莲花来,这才算是装修。但今天我们装修时不吊顶了,因为我们发现居然还有另外一种粗放的美,这种美显然比在石膏吊顶的天花板画上莲花、画上攀枝纹更有力量,力量不就是一种现代美吗?

阿来

著名作家。1959年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。主要作品有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《机村史诗》《格萨尔王》《瞻对》《云中记》等。《尘埃落定》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

阿来自述

亲近雪域高原 体味自然之美

有一年“名家看四川”系列活动,主办方邀请作家中的大自然爱好者,去黑水县境内新开发的风景区达古冰川走走看看。那里不仅有壮美的雪山风光,更有从海拔2800米到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造就的地质景观与植物群落的垂直分布。我决定不随团行动,但对工作人员建议:安排的饭食要有山里的春天——刚开的核桃花、新鲜的蕨菜。

这个时节,村民们会把将导致核桃树结出过多果实的花序一条条摘下,轻轻一捋,那一长条肥嫩的雄花与雌花都被捋掉了。焯了水拌好的,其实是那些密集的小花附生的茎。什么味道?清新无比的洁净山野的味道!而在那些不被人过分打扰的安静村庄,蕨就生在核桃树下,又嫩又肥的茎,从暖和肥沃的泥土里伸展出来,一个晚上,或者一个白天,就长到一拃多高了。要赶紧采下来。不然,第二天它们就展开了茎尖的叶苞,漂亮的羽叶一展开,为了支撑那些叶子,茎立即就变得坚韧了。乡野的原则就是简单,取了这茎的多半段,择去顶上的叶苞,或干脆不择,也是在滚水中浅浅焯过,一点盐,一点蒜蓉,一点辣椒,什么味道?苏醒的大地的味道!

黑水县城分成两个部分。先到的老县城。即便地处深山,这些年被城镇化的潮流所波及,要到城镇上来讨生活的人越来越多,地处狭窄谷地的老县城容不下这许多人了。汶川地震后,在老县城上方一公里多,建起了新县城。新建了一些机关和商业网点,更多的是往城里聚居而来的四乡村民。县里请作家们吃饭,当地猪肉,这种猪半野放,肉香扑鼻,是名藏香猪。野菜多种。最受欢迎者有三。一种,土名刺龙包。其实是五加科楤木的肥实叶芽。蕨菜和核桃花已经说过。这些野味入口就是清新的山野气息,加上所有人都会想到无污染绿色这样的概念,就更觉得不能不大快朵颐了。

达古景区主诉的是两个卖点:一个,雪山和冰川;一个,秋天的彩林。高原上春天来得晚,初春过后,直接就进入了生命竞放的夏天。十数种杜鹃,十数种报春,十数种龙胆,十数种马先蒿,几种绿绒蒿,金莲花银莲花,金露梅银露梅,那么多的高原植物渐次开放,把整个高原的夏天开成一片幽深无尽的花海。

我总觉得,达古景区这样的地方,可以成为中国人体味自然之美的一个课堂。地理之美,植物之美,共同构成自然之美。虽然时兴的国学热中,常有人说中国人如何具有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观,如何取法自然,但在实际情形中,却是人与大自然日甚一日地隔膜与疏远。回望这即将消逝的田园风光,我想,这一辈子我都将以且喜且忧的、将信将疑的、越来越复杂的心情,来探望故乡的春天。

(部分内容摘自阿来新作《西高地行记·故乡春天记》)

讲述

收藏老药瓶追根溯源,记住天津老字号药铺

中医药历史文化博大精深

文 赵磊 陈茗

提起收藏,很多人会想到瓷器、钱币、玉器、古籍、字画、家具等,而王庆昆却另辟蹊径,结合自己在同仁堂制药厂工作多年的经历,专门收藏药瓶、药罐、药壶、药鼓、药杵、药碾子、脉枕、药目、仿单等医药类古旧物品。走进他家的客厅,摆满藏品的文物架占了整整一面墙,俨然是一座小型中医药博物馆。这些藏品见证了天津中医药行业的历史变迁。

曾为老山前线战士捐赠药品 老药瓶佐证天津同仁堂历史

王庆昆出生于1949年,毕业于天津中药学校,参军复员后分配到同仁堂制药厂,曾担任主管销售和技术的副厂长。在厂里干了一辈子,印象最深的一件事,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同仁堂制药厂曾为老山前线战士捐赠风湿寒痛片,王庆昆亲历了这件事的全过程。

当时已是副厂长的王庆昆,接到厂办公室转给他的一封从老山前线寄来的信。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在进行中,解放军战士驻守阵地,在猫耳洞里一蹲不是一天两天,甚至要蹲上一年半载,好多战士得了风湿性关节炎。信中说,猫耳洞又冷又潮又湿,战士们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听收音机,碰巧听到同仁堂制药厂风湿寒痛片的广告,于是来信想买药。

王庆昆心潮起伏,他不敢耽搁一秒,赶紧把情况上报给厂领导。厂务会研究讨论,决定为老山前线的解放军战士们捐赠20箱药品。这件事由王庆昆负责执行,把药品按照信的地址转到部队。几个月后,厂里再次收到前线来信,是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,还有一面锦旗,感谢药厂的无私支持。

上世纪90年代,王庆昆喜欢上了收藏。有一次逛沈阳道古玩市场,在地摊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个小药瓶,一面印着“同仁堂”,一面印着“张记”。摊主要价20块钱,王庆昆毫不犹豫地将其拿下。

据厂里老职工所讲,北京同仁堂又称“乐家老铺”,清末在天津开设仓库,药品走水路销往南方。精明强干的张益堂受雇北京同仁堂,在天津管理仓库,娶了乐家的女儿,多年后独立出来单干,开了天津同仁堂,各做各的药。那时候品牌意识不强,只靠祖训约束,两家并没有什么冲突。

到了民国年间,北京同仁堂在天津法院立案,状告天津同仁堂“侵权”,而在当时,天津同仁堂已发展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药铺。由于原告、被告既是同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所以他们白天在法庭上争得面红耳赤,晚上在家中把酒言欢叙旧。最终判决结果是:天津同仁堂一定要和北京同仁堂有所区别,要标注“天津同仁堂张记”,不允许使用北京同仁堂商标,不能卖北京同仁堂的特色药,同时也要向北京同仁堂支付赔款。

一个小药瓶佐证了天津同仁堂的历史。王庆昆兴奋至极,如获至宝,“这是我的第一件中医药类藏品,后来我们厂建立厂史展厅,我把它捐了出去。”虽然历史已远去,但通过这个看似普通的小药瓶,天津同仁堂的始末缘由被再次挖掘出来,这些故事今天听来仍然鲜活生动。

专注收藏中医药老物件 挖掘老字号药铺的历史

和很多收藏爱好者一样,王庆昆最早入门收藏是从瓷器开始的。他加入了天津市收藏协会,结识了不少圈内朋友,经验丰富的老先生给他提建议:“瓷器价格太高,一般人真玩不起,很难提升收藏的品质。你既然在同仁堂工作,对中医药应该很熟悉,中医药历史厚重,而且在咱天津收藏圈是一个空白,何不专注于这方面的收藏呢?”一句话点醒梦中人,王庆昆心想:“我身边认识的人全是搞中医药的,我在这个领域搞收藏可谓如鱼得水,肯定能做出点儿成绩来!”

与中医药相关的旧物,诸如中药器具、典藏医药古籍、老字号药店的药目、民间验方手抄本等,可谓种类繁多,王庆昆还是从老药瓶入手。收藏老药瓶的难度也不低,因为谁吃完药也不会把药瓶保存下来,但随着药瓶的存世量越来越少,研究价值也逐渐凸显,价格随行就市,水涨船高。他一有空就往古玩市场跑,发现心仪的宝贝,千方百计也要淘到手。“我以前在沈阳道买的药瓶都是几块钱、十几块钱一个,现在基本上都得一两百块钱。”

王庆昆与他的藏品

每个药瓶上都印着老字号的名字,像什么隆顺榕、同仁堂、达仁堂、万全堂、真一堂……而且很多都印有“天津”的字样。随着城市发展,过去天津知名度比较高的老字号药铺相继换了名号,有些也从老店搬到了新址。王庆昆就想通过对这些老药瓶的收藏,追根溯源,记住这些天津老字号的历史。

那时王庆昆还在厂里上班,他自己争取到一项任务——编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的厂史。“厂领导很支持,我们查找了很多资料,带着同事走访老职工以及创始人家族的后代,积累了珍贵的口述资料。”他把收藏和对厂史的研究结合起来,并乐此不疲。厂里有人跟他开玩笑,说他捡的这些破烂儿扔马路上都没人要,他一笑了之,该捡还捡,该买还买。

在药厂仓库的一个角落里,他发现了两块被灰尘覆盖的立匾,每块足有两米多高。“过去的老药铺,门前左右会各挂一块立匾,一人多高,相当于广告牌。我们厂这两块立匾比一般的要高,所以叫‘通天牌’。”牌匾上分别刻着“京都同仁堂精制丸散膏丹参茸药酒”“京都同仁堂精选南北生熟地道药材”,可以说是“镇店之宝”。厂领导很重视,马上派人把立匾擦拭干净,专门做了展柜,陈列在厂史展厅里。

每一件藏品背后 都有大量历史信息

王庆昆在地摊上淘到一本民国初年的《京都达仁堂丸散膏丹药目》。那是一本毛头纸木版印刷的线装书,介绍了当时达仁堂的药品名称、功效特点。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了前面十几页,不知被谁装裱过,从外面看不出来。他总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,直到半年后,他在鼓楼市场又发现了十几页“药目”,主要是讲达仁堂的历史由来。王庆昆欣喜若狂,买回来后仔细对照,发现虽然和自己那部分不是同一个版本,但内容应该是一致的,已经很难得了。他请专业人士重新装订,订好后跟原版的一模一样,成为他最珍视的藏品之一。

还有一次,他去古文化街逛地摊,无意中发现了两张达仁堂乐家老铺的仿单。所谓仿单就是说明书,过去商铺在包装纸上盖有一个木刻印章,介绍商品的功效、用法等。随着印刷工艺的进步,仿单又兼具了信誉保证、防伪标签的功能。薄薄的两页纸,摊主要价100块钱,王庆昆觉得不值,没舍得买。回到家越想越后悔,吃不下饭睡不好觉,之后多次到古文化街寻觅。过了很久,他终于碰上了那个摊主。摊主已经认不出他了,他从册子里抽出包括那两张仿单在内的四张纸页,摊主要价还是100块钱。王庆昆捡了个漏儿,心里美滋滋的。

回到家,他仔细研究这两张仿单:一张为“银翘解毒片”,另一张为“香连片”。银翘解毒片的仿单上印着“国药改进科学制品”,另有几行详细介绍:“本方系根据清初吴鞠通氏所拟银翘解毒丸处方,经我店改用科学方法提炼制成片剂,其功效与原丸药无异。”此外还印有主要成分、主治等内容。两张仿单的与众不同之处,还在于上面都用红颜色印着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八个镂空字。这说明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,中药新剂型已经研制成功。这里面包含的诸多信息,为了解中药行业的习俗和发展提供了实物史料。

王庆昆把散落在民间的宝贝一个个挖出来,留下累累硕果:“天津收藏老药具的人屈指可数,可以交流、交换藏品的朋友也不多。但收藏圈有很多藏友为我提供信息,或者慕名而来,看过我的藏品后,都感慨中医药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、丰富多彩。”

或许在别人眼中收藏往往会跟经济利益挂钩,但在王庆昆看来,借助这些与中医、中药相关的瓶瓶罐罐、故纸旧物来研究天津中医药的历史,理清发展脉络,就是最大的价值。“如果这些物件没有了,历史拿什么佐证?所以收藏的乐趣就在这儿,每一件藏品背后,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。”